

閱讀歷史 認識中國

中文大學出版社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夏 · 2009 · Summer · 免費贈閱 · free

特稿 | 戴晴 《在如來佛掌中》：我為什麼和怎樣寫出了這本書 | 高華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出版十年感言 | 鄭會欣 參與翻譯徐中約《中國近代史》 專訪 | 編輯室 瘋狂歲月裏的理性選擇：訪王紹光教授談他的文革經歷和文革研究 文摘 | 莫里斯·邁斯納 中國社會主義實驗的失敗 | 芭芭拉·巴努茵、余長更 周恩來的真實形象 | 韓少功 「文革」為何結束？ | 歷史檔案 尼克松與周恩來就臺獨問題交鋒 | 趙鼎新 八九學運：走上軍事鎮壓之路

閱讀歷史 認識中國

夏 · 2009 · Summer · 免費贈閱 · free

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www.chineseupress.com

✉ cup@cuhk.edu.hk

☎ (852) 29465300 · 📠 (852) 26037355

版權所有，不得轉載

目錄

編者的話

特稿

- 戴晴 《在如來佛掌中》：我為什麼和怎樣寫出了這本書 2
- 鄭會欣 參與翻譯徐中約《中國近代史》 6
- 高華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出版十年感言 9

專訪

- 編輯室 瘋狂歲月裏的理性選擇：訪王紹光教授談他的文革經歷和文革研究 14

文摘

- 韓少功 「文革」為何結束？ 17
- 芭芭拉·巴努茵 (Barbara Barnouin)、余長更 周恩來的真實形象 21
- 歷史檔案 尼克松與周恩來就臺獨問題交鋒 24
- 莫里斯·邁斯納 (Maurice Meisner) 中國社會主義實驗的失敗 27
- 趙鼎新 八九學運：走上軍事鎮壓之路 30

精選書單

培養歷史的眼光

金融海嘯的突然來襲，使我們的事業陷入困境；我們身處的社會，回歸以後總是在爭議聲中停滯不前；國家在經濟繁榮的面紗下，也有不少待解決的隱患。個人、社會和國家的發展，似乎都在十字路口徘徊不前，到底出路在何處？這既是對我們的考驗，也是對我們領導人智慧的考驗。

但是對於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一個人，甚或一件事件，如果不認識它的過去，如何理解其當下所代表的意義，又如何判斷其未來的走向？

抗戰初起，國學大師錢穆在輾轉流徙、空襲警報頻傳的情況下，撰成《國史大綱》，其最後一章最後一節的標題為「抗戰勝利建國完成中華民族固有文化對世界新使命之開始」，對中國文化前景許以承諾，藉此喚起國人團結抗日並最終取得勝利的決心。

行伍出身、中年才開始治史的黃仁宇，從「大歷史」的宏觀角度，檢視中國現代的長期革命，認為今後中國的重要課題，是如何在高低層機構中建立法制性的聯繫，使整體發展走向合理化。

著名史家唐德剛在綜論中國自鴉片戰爭時期開始的政治社會制度大轉型時，以「歷史三峽」來比喻這次大轉型，並認為要通過「歷史三峽」，大致要

歷時兩百年，到2050年的時候，中國就可進入現代文明國家之列。

學貫中西歷史的許倬雲，在其最新著作《我者與他者：中國歷史上的內外分際》中，從內外、主客關係的歷史演變，以及世界文化的比較視野，對「中國」及「中國人」身份的定義作出歷史解釋。展望未來，他認為中國文化中，有一些可以匡救西方文化缺點的成分。合則雙美，離則兩傷，將許多非西方文化系統的成分，納入人類共同文化之中，是我們共同的責任。

史家對中國文明以至人類文化走向的判斷，並非浮誇的空言，而是要有深厚的人文底蘊、豐富的歷史知識積累，才可以培養出深邃的歷史眼光。

歷史的眼光並非一朝一夕可以得來。若我們有志於養成這種歷史的眼光，當從閱讀歷史書籍開始。故中文大學出版社以「閱讀歷史，認識中國」為題，製作這本特刊，組織和選輯了一批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重點文章，並預備了一份本社出版的中國近現代史書單，以助讀者通過這些文章的啟發，尋找感興趣的近現代史切入點，建立自己的歷史作坐標。▲



戴晴耗時八年，遍訪人物，廣擷史料，完成了歷史紀實之作——《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解開了「張東蓀叛國案」的謎團。我們特邀她撰寫此文，道出成書過程的種種曲折。

《在如來佛掌中》 我為什麼和怎樣寫出了這本書

■ 戴晴

做過一件事之後，應邀回想做這事的發端，不一定很明智，因為你握筆（如今是敲鍵）的時候，書和書評都出來了，讀者或聽眾的預期（包括批評）已為作者所知。於是，寫出來的，不小心就會被牽著走——這就失了真。但出版社覺得不見源頭小溪，下游再淘湧也不完滿。怎麼辦？——那就來點屬於花絮的小故事吧。

（一）

1990年代中，我得到一份短期研究基金，在澳洲國立大學的當代中國中心（坎培拉）寫三門峽。「聖誕/新年長假」來到，這個南半球大國首都反倒空了——辦公室、校園，乃至一片片住宅區，顯得只剩我孤身一人。應朋友之邀，來到熱鬧的墨爾本，給拉進一處住房：鬧哄哄的一屋子人，大人小孩，花花綠綠，生疏的、熟悉的，大家走來走去互相介紹。

我和Ella找了個清淨角落坐下。她原是國內一家很有聲望刊物的編輯，那時正和一批同樣有著大學學歷和工作資歷的姑娘，在餅乾廠的流水線上「抓糖」——到了人家國家，只能先打工糊口。每當有人從我們面前走過並好奇地對我這個新人瞄上兩眼，她就會順口介紹一下：「這是戴晴，在北京……」

一位從旁順耳聽見的女士停了下來：「你就是戴晴啊……嗨，你可真煩死我了。」

在海外華人群，這樣的初識場面不多。我於是問：「請問哪裏冒犯了？」

「不是你，你的書。真把我煩死了。我是看你們那種書的人嗎？我就看

瓊瑤的書，看愛情小說。可我們那口兒非逼著我看你的……」

「這可真太對不住了。請問令夫君……」

「嘿，他要知道你在這兒……」她趕忙跑出去打電話，旋即轉回，「立馬就到！」

我於是認識了Ella的工友、北京姑娘林小燕和她的「那口兒」：「X案件」主犯、東蓀先生第三孫、坐牢十六年後隨妻子一同去國，那時節正在墨爾本一家醫院做清潔工的張鶴慈。

我們中國的人才啊！

張鶴慈鬍子拉碴、雙目炯炯。見面無一句寒暄，只說：「讓她看的是儲安平那本。你在裏邊寫到了我祖父。」

「……」我感到非常不安，因為作為「反右鬥爭三十周年」紀念文字，寫《儲安平與「黨天下」》的時候，注意力都集中到那位我曾經服務的《光明日報》前總編、不改右派儲安平身上。明知《觀察》特約撰稿人個個尋常非比，比如東蓀先生，我的研究與著墨實在愧見這些受難人的親屬。

「我這兒有爺爺詩詞手跡。沒抄走的。還有還回來的。」張鶴慈沙啞著嗓子說。

面對著零散但成摞的手跡殘篇，我茫茫然無所措。鶴慈直覺祖父十分了得，覺得應該讓後人知道中國學界——乃至政界——有這麼一個人。他表示願全力配合寫出祖父。是啊，重要人物、重大事件、不為人所知的原始素材、親屬誠懇無私……哪一個作史的人會無動於衷？

但只看《觀察》，是不能算讀過張東蓀的。趕緊到大學圖書館補課。找《時事新報》、找《再生》、找他最後四大本……東蓀先生一篇篇著作就這麼匆匆複印、補讀。那時候張家的人我只見過鶴慈一個，沒有人說起選票的事，朱振才的文章也還沒有見到。我當時只覺得不讀東蓀先生形同近現代史白癡：怎能只知康梁？怎能只知仲甫、魯迅？遑論忽地又快成自由派偶像的胡適。當然，「突然給滅掉」——那麼早、從那麼高的位置上——則一直梗在心中，覺得內裏一定有什麼東西在起作用。什麼呢？

臨回國，我在澳洲國立大學當代中國中心做了一個沒什麼把握的介紹：對關注中國歷史和現狀的洋學問家們說說這位哲學家。他們對「張東蓀」三個字有點模糊印象，也知道北平的「和平解放」（以為是交戰雙方深明大義）和「一邊倒」（以為是當時的外交政策）。白杰明（Geremie Barmé）沒等我講完就說：這個人物不得了，一定把他寫出來。

（二）

「一定把他寫出來」，談何容易？

張東蓀(1886–1973) 是近代中國最早的西方哲學譯介者，著名政論家、報人，燕京大學教授。1949年他以國共雙方第一居間人的角色促成北平和平易手。毛澤東曾不止一次在正式和非正式場合說：「北平和平解放，張先生第一功。」中共建政後不久，身為第一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的張東蓀，旋被定罪，從此銷聲匿跡……

那年頭還沒有互聯網。我這種沒了工作證的人，稅雖說照交，使用檔案包括國家圖書館，卻要受限制。人海中，張鶴慈的哥哥張飴慈介紹了左玉河——早在河南讀大學時，左的學位論文就是張東蓀，接著又做了碩士、博士。就披覽考證東蓀先生原著而言，左玉河無疑工夫下得最多也最扎實。我們商定攜手互助、「資源共享」——包括對親屬的採訪和不得不以非常手段獲得的資料。比方說，民盟中央如何窺聖色邀好而對自己多年盟友落井下石。

他們一本正經地幹下的那樁殞事必有記載，本屬常識。可惜在供研究者披覽的民盟史裏，對此一字不提；拿著介紹信、找到資料檔案俱全的民盟總部，也遭「客氣」回絕。具體說，就是現在已經白紙黑字發表在書裏的〈關於張東蓀叛國罪行的報告〉（總號 19757 報告類 張東蓀罪行項編號 009 保密 定期收回）。我是怎麼看到它，並且將它如實翻錄下來的呢？

想來讀過《在如來佛掌中》的人，都記得葉篤義：少年公子老封君（民盟中央副主席）是也。只不過他的公子時代並未像張愛玲父親那樣豪華地自我作踐——他用家裏的錢讀燕京、辦書店；而從公子到封君的一段，也是大起大落、激情加坎坷。在後記裏，我曾寫道：「已經不再是燕京學生、早期民盟幹員、後期民盟副主席的葉篤義，也在離世前，出於對傳主（以及施虐者）的認識、再認識、再再認識，傾力幫助在中國近乎『路路不通』的著者」——怎麼傾力幫助的？

那是1996年。在民盟總部和檔案館碰壁之後，我來到葉篤義家。若論關係，可算有一點：我編《中華英烈》的時候，曾請新華社老資格編輯方實（葉篤義的六弟葉篤成）做顧問；方實的女兒葉維強曾是我在《光明日報》服務時候的小朋友。我前往羅道莊拜望篤義先生。他雖在病中，心卻不糊塗。說到四十多年前的那次批鬥會和大會記錄，他沒怎麼想就對我說：「我跟他們調。我寫回憶錄要用。」

不久，即接到讓我再到他家的電話。剛坐下，就聽見門鈴：一名民盟中央幹部乘專車趕來，將「葉副主席要用」的資料親送到家。葉篤義說：「好，放在這裏吧。用過之後通知你來取。」這意味著他一走我就可以把這份1953年的會議記錄暨決議拿到街上複印了。來人說：「您看吧，我就在這兒等著。您用完了我帶走。要用的時候再送來。」

不知這是盟內調閱文檔的通例，還是葉「動筆」之希圖已然驚動了主管人，從而訂出了新規矩。這「驚動」最大的可能是「怎麼著，要攪一攪張東蓀案這個大糞坑!？」至於攪坑者為誰何，副主席抑或「臭名昭著的資產階級自由派代表人物」（筆者），還在其次。來人態度雖然堅決，尚注意基本禮貌。將文檔放在葉副主席書桌上，他就退到了外屋——兩間房之間的門開著，他可以看到裏間，也可以隨時進來，但只坐在房間另一端的沙發上，與我們保持著不與聞談話的距離。

幸虧我的包裹另有利器：錄音機。我拿起一張報紙，作出舉著看的樣子，實為隔斷我與外屋之間的視線，然後一頁接一頁輕聲對著話筒讀（讀者從出版社網頁公佈的這份文件裏，在屬於表態範疇的結尾處，可看到多處「……」，這就是為省時間而略去的「萬歲」等套話）。幾份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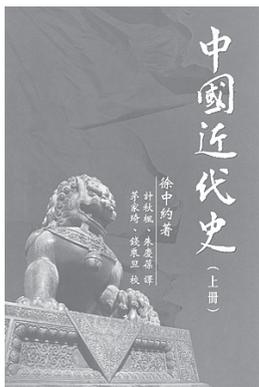
件，包括〈補充交代〉、〈補充的再補充〉、〈再再補充〉，以及〈關於張東蓀叛國罪行的報告〉在大約二十分鐘裏錄畢。其間，葉篤義曾走來走去倒茶換水。我們三人誰對誰都沒說過話。可惜民盟明文記載的「自1952年3月10日起至1953年7月25日止共有53頁」的卷宗（裏邊有批鬥大會諸位發言），未能全部錄下。

錄音翻為文字之後，立刻發給張家親屬，並與左玉河等人「攜手互助、資源共享」。沒想到共享的結果，竟是這位體制內研究人員對它的率先發佈。雖說在他1998年出版的《張東蓀傳》最後一頁的腳註中，也禮貌周全地衷心感謝張家親屬「提供資料」（記得書中發表的檢討殘片麼？）；感謝「筆者所尊敬的一位不便提名的女士提供了非常寶貴的資料」；可惜作為「黨中央國務院智囊團」學者，雖說安享的也是納稅人的錢，卻只有甘願置身於黨對意識形態嚴控之一途。基於此，傳主在嚴逼下的自我貶損，變成這位思想家白紙黑字的欣然供認。「不便提名的女士」和張家後人駭然、慘然之餘，不得不認可這一現實：東蓀先生「消失」近半個世紀後，終於有人「把他寫出來」了。我這慢手的日子更不好過了。張飴慈鄭重慨言：你什麼時候動筆呀？是不是我活著時候能看的，就左玉河這一本傳記了？

2009年，我將新書送到張飴慈手上。提在扉頁上的是：另一本書出來了。你還活著。

（三）

用了好幾年功，東蓀先生的故事，對著者而言，已成藏在心裏卻隨身帶著的知識與智慧寶庫。時至今日，每讀網頁跟貼，或者哪家傳媒打來越洋電話，追索該日發生在我們老大中華的事，著者腦子裏轉著的，竟然總是「東蓀先生如果在世，他會怎麼說？」▲



華文出版界出版的中國近現代史教科書囿於各種意識形態、史觀的限制，未能對中國近現代發生的重要事件作出公平公正、客觀冷靜的評介。《中國近代史》譯者之一鄭會欣，撰文細談該書特色及他參與翻譯的來龍去脈。

參與翻譯徐中約《中國近代史》

■ 鄭會欣

2002年我曾為《中國近代史》的中譯本出版作過一些聯絡工作，後來還參與了下册部分章節的翻譯，事隔多年，回想起來，感受仍很深刻。

作者背景及原著特色

《中國近代史》英文原名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是英語世界中解讀和介紹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一部重要作品。作者徐中約 (Immanuel C. Y. Hsu, 1923–2005) 生於上海，戰時在大後方求學，抗戰勝利後於燕京大學政治系畢業，即被派赴中國政府駐日本代表團工作。不久內戰重啟，徐中約便赴美國留學，先後獲明尼蘇達大學碩士、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徐中約教授自1958年開始任教於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歷史系，直至1991年退休，桃李天下，著作等身，其中影響最大的就是這部《中國近代史》。

該書由牛津大學出版社於1970年出版，甫出版即受到學界的極大讚譽，1971年獲加州「共和獎」(Commonwealth Prize)，1978年牛津大學出版社紀念成立五百周年時，曾列舉該社出版的數十部著作為其代表，該書即為其一。作者不囿於一家之言，更無意識形態的束縛，在寫作時參考大量中外學者的著述以及檔案資料，將清朝以來近四百年的中國歷史娓娓道來，著意以公正客觀的態度，對中國近代歷史的發展加以回顧和解說。

該書發行人極大，不斷再版。作者每次再版時不但對內容有所修正，更重要的是跟蹤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並運用新近發佈的歷史資料，續寫新的內容，因此多年來該書一直為歐美諸多大學指定教科書。然而遺憾的是，這樣一部以英文講述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重要著作，長期以來卻沒有中文譯本，因而絕大多數中文讀者無法從中受益。

1998年，徐中約教授應邀以偉倫訪問教授的身份前往香港中文大學進行學術交流，此時香港剛剛回歸祖國，社會上對於了解中國近代歷史的發展充滿濃厚興趣。徐教授訪港期間有感於此，即萌生將其著作介紹給中文讀者的願望，而中大出版社更是早有翻譯此書的計劃，由中大歷史系的郭少棠、梁元生、劉義章等教授從中牽線，雙方一拍即合，這就是中譯本出版之緣起。

出版之事既成，下面的工作就是尋找合適的譯者。該書內容博大精深，譯者不僅要具有良好的中英文水平，更重要的是，譯者必須同時是優秀的歷史學者，方能勝任這項工作。恰巧此時我的老師、南京大學歷史系茅家琦教授來香港參加學術會議，藉此機會，我將茅教授介紹給當時的中文大學出版社社長陸國燊博士。茅老師是國內外著名的歷史學者，以研究晚清與太平天國史聞名於世，最近二十年又將研究的視野拓展到1949年以後的台灣，著述豐碩。他早就看過徐教授的這部著作，也很願意將其介紹給中文讀者，因而雙方很快就對翻譯之事達成共識。茅教授回南京後，即推薦了兩位中青年學者計秋楓（現任南京大學歷史系副主任）、朱慶葆（現任南京大學校長助理）擔任翻譯，再由他和另一位著名的世界史學者錢乘旦教授校審譯稿。

保持原貌的翻譯

自2000年開始，計、朱二位就開始翻譯全書，出版社的編輯始終與他們保持密切聯繫，並隨時將譯稿呈送徐教授閱覽。在翻譯的過程中，曾發生過一段鮮為人知的小插曲。

《中國近代史》是根據徐中約的最新修訂本，即牛津大學出版社2000年的第六版翻譯的。在第六版中，徐先生將中國近代史的下限一直延伸到1998年，其內容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國的改革開放路向、1996年前後的台海危機以及兩岸統一等問題。徐著雖然是一家之言，但上述話題目前在內地仍然十分敏感，因此譯者曾提出最後幾章是否可以略去不譯。然而出版社和原作者卻堅持無論是文字或是內容，譯文都必須保持原著風格，不應予以刪節。最後，還是當時的社長陸國燊出了個主意，他認為既然內地譯者不便翻譯，那最後幾章的內容就由香港學者承擔。這一提議立即得到雙方的贊同，我就是這樣被推了出來，承擔下冊第40-42章的翻譯。我只好勉為其難，好在譯文先由茅、錢二位教授審閱後，最終得到徐教授的認可，也算是完成了這一任務。

徐著中譯本《中國近代史》於2002年在香港問世後，立即引起讀者的極大興趣，香港和台灣的許多大學均將本書列為歷史系或通識課程的必讀書目。《中國近代史》的出版同樣引起內地讀者的關注，我曾多次在網上看到國內讀者推薦的文章，並將此書列為最值得收藏的著作之一。

參與《中國近代史》一書的翻譯也引發我不少感受。我記得非常清楚，二十年前我準備到香港定居前曾到茅家琦老師家辭行，當時他就對我說，香港是最適宜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地方，希望我能有所作為。慚愧的是，多年來庸庸碌碌，未能完成老師的期望，但老師的這番話卻時刻記在我的心上。

香港雖然曾長時間是英國殖民地，但在學術上卻享有相當寬泛的自由，尤其是在海峽兩岸同時處於強大的政治壓力下，香港的學人未曾受到任何意識形態的束縛，可以自由地進行學術研究，官方對此基本不會加以干預；而且香港學者可以自由進出內地和台灣，不僅可以看到兩岸最新的出版物，還可以前往各地檔案館查閱原始資料，這在二十多年前對於兩岸學者來講，是根本辦不到的；再者，香港是個國際大都會，學者大都接受過西方的訓練，具有良好的外語能力，較容易吸收外國最新的研究成果。因此撰寫一部資料翔實、觀點公允的中國近代史，應該是香港學者義不容辭的責任。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這個任務始終未能完成。隨著海峽兩岸政治的逐步開放，經濟力量的不斷發展，特別是年輕一代學者的迅速成長，可以說，香港已經漸漸失去了以往所具有的這種優勢。

但是值得慶幸的是，香港仍有不少出版社堅持出版中國近代及當代歷史的著作，特別是中文大學出版社多年來一直堅持這一理念，而目前在中文世界中有兩部為人稱譽的中國近代通史，就都是由中大出版社出版的。除了徐著，早在二十多年前，該社就出版了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創所所長、著名歷史學家郭廷以上下兩冊的《近代中國史綱》，而這部書稿的下冊因涉及到國共內戰，觀點比較公正，當年在台灣卻是不許出版的。▲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出版十年來，作者高華收到大量對該書的各類反映，當中有不少是學者的高度評價，自然也有各種批評意見。且看他如何回應這些意見，並談談他擬定中對該書的修訂計劃。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出版十年感言

■ 高華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以下簡稱為《紅太陽》)一書出版後，承蒙讀者的厚愛，這十年來我收到許多讀者來信，有來自大陸各地的，也有港、台的，還有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日本、澳大利亞，甚至來自遙遠的希臘克里特島。這些來信大多查詢怎麼購書或表示讚許、鼓勵。李銳、王元化、楊振寧、汪澍白、陳方正、馮蘭瑞、吳敬璉、劉賓雁、王年一、林毓生、張灝、韋政通、張玉法、董健、魏良弢等老先生對我的書都給予很高的評價。在學界，這本書也受到普遍的關注和好評，用一位評論者的話說，「知識界讀過此書的，均對此書懷有極為深刻的印象」。

外界對本書的意見

一些學者特別強調了本書的「歷史—現實」意義，蕭功秦教授說：「這本史學專著是一部凝聚著中國新一代知識分子對自己生活於其中的時代進行理性反思與心靈體驗的傳世之作。它深刻地揭示了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並通過這一揭示回答了一系列發人深思的問題。」

謝泳教授稱本書「雖然是一本嚴謹的史學著作，但其思想啟蒙意義不可低估」。

中國人民大學的蕭延中教授則從思想性和歷史敘述創新的視角論述了本書的價值，他認為九十年代以來，中國存在著「官方」的、「新左派」的和「自由派」的有關毛的敘述，而本書作者則被他列入毛研究的「歷史主義學派」。蕭延中寫道：「僅對毛澤東研究的學術突破而言，高華的這本著作，不僅在於史料的細膩整理，更重要的是修正、擺脫，甚至顛覆了自四十年代陳伯達、胡喬木以來官方意識形態固定的解釋框架和話語表達，而獨創了一套嶄新的歷史敘述模式。在一定意義上，它成為中共黨

史『新史學』的重要範本之一。」

法國華裔學者陳彥博士說：「此書雖然是一部嚴肅的史學專著，但卻具相當的可讀性。僅以人物為例，作者善於通過特定的事例，以簡練的筆法勾畫出歷史人物的鮮明個性。項英的剛直不阿，周恩來的忍讓練達，任弼時的圓通持重，王明的書生幼稚，張聞天的正直謙讓，康生的奸滑陰毒，彭德懷的耿直豁達等等，一代共產黨先驅人物形象躍然紙上。毛澤東自然是此書的中心，高華筆下的毛澤東老辣跋扈、縱橫捭闔、收放自如，具有鮮明的個性。他相信權力，相信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力量。與毛相比，王明雖然是斯大林的學生，他學而且信；毛澤東也學斯大林，但學而不信。信的最終鬥不過不信的。」

美國西雅圖大學梁侃教授說：「從現在起，任何人不可不讀《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都無法進行有關整風運動的論述與交談。」

對於西人來說，理解毛有他們的角度，站在西方看東方，更多的是看到毛的革命家的一面，毛基本被定義為革命家、東方羅賓漢，游擊戰的英雄，幾十年都如此，從政界到學界，崇拜毛的不計其數。不管中國的左右運動、大躍進、文革的災難有多深重，也不會影響他們對毛的先驗看法。如此，也是有理由的，毛有讓西人著迷的地方，諸如詩人氣質、底層情結、反蘇、反官僚體制、反世俗主義等等。

在另一方面，近三十年來，隨著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西方學者較多的關注研究中國最新的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毛和中國革命的話題總體上已淡出那些中國問題專家的視野。即使如此，在多元化的美國中國學界，仍然有人關注中國歷史學界對這些議題的新的研究。美國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周錫瑞教授（Joseph W. Esherick）認為，「高華論述整風運動」，以及其他學者的專題研究，「從某種程度上說，他們所有的著作皆影響了中國當代諸多知識分子的政治關懷」。「高華嚴謹的學風與持平的判斷為當下PRC（中國人民共和國）內出色的黨史研究樹立了極佳的典範。」

在聽到大量稱許的同時，對本書也有若干批評的意見，有一種看法認為我的書「傾向性」較強，對毛的「權力鬥爭」寫得多了，而對毛的理想層面較少著墨。也有學者從另一個角度關注作者的「傾向」，陳彥博士寫書評稱，作者有思想矛盾，從本書的思想邏輯演進應得出否定中共革命的結論，但作者卻對中共革命深表同情；蕭功秦也認為，本書隱隱透露出作者的某種思想矛盾：在作者看來，基於反抗社會壓迫的一切革命都有其歷史合理性，然而，另一方面，作者似乎又對革命的悲劇性一面持有強烈的人文主義情懷。

遇資州教授（某著名學者的化名）在對本書的書評中寫道：「延安整風」儘管相當殘酷、極左、陰謀，其實相當必要。毛澤東不愧為真正的政治領袖，……從黨的生命和使命來看，毛搞整風奪取黨的最高領導權，可謂歷史危難中的當仁不讓。說到殘酷，現世政治有過不殘酷的嗎？所謂「極左」，不左還算共產黨？「整風」是黨的運動，黨搞運動，我等黨外人沒有置喙餘地。「整風」如果只整黨人和熱愛黨的人，就沒有什麼不正

當。共產黨不是自由黨或社會民主黨，向共產黨要求「民主、自由、獨立、社會正義和人道主義」，可能一開始就找錯了人。「整風」中所迫害的知識人，誰不熱愛共產黨？受迫害為什麼不逃離延安（書中僅提到兩例逃出）？經過運動後，受迫害者不大都變成了以後「運動」中整人的人？

對批評者的六點回應

一本書出版後，有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的，在幽幽歷史迷宮中上下求索，本來就是一場智力探險。對《紅太陽》作者的探險結果，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以公正和客觀的態度對本書作出評價，包括指證該書存在的不足或缺點，對於作者都是教益。對於前述的批評意見，我是這樣看的：

（一）在談論和研究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上一些深刻影響人民生活和命運的重大歷史事件時，一個學者不可能沒有他的價值傾向，十年前，我在本書的「後記」中說，我認同五四的基本價值，那時是這樣，現在還是如此。問題是，作者的價值觀不能妨害他作為學者的客觀性和公正性，我相信自己做到了這點。反觀有些中國近現代史的著述不僅順從「長官意志」，還想方設法用學術的包裝，為「大人」或「聖人」的明顯錯誤辯護，卻沒有人批評他們的「傾向性」，這是很奇怪的。

（二）毛的「君師合一」地位奠定於延安整風，這是《紅太陽》一書敘述的重點。將《紅太陽》有關毛澤東敘述解釋為「是搞『權謀政治』」，則未誤解本人的觀點。在前言中，我寫得很清楚，毛發動整風運動有其思想追求，「延安整風運動是……重建以毛為絕對主宰的上層權力再分配的過程。同時，延安整風運動又是毛澤東以自己的理念和思想，徹底轉換中共的『俄化』氣質，將中共改造成為毛澤東的中共的過程。」至於毛看重權力，這沒有什麼可諱言的，政治家欲成就大事業，當然離不開對權力的追求。1972年春，周恩來在毛被搶救蘇醒後對他說的第一句話就是：主席，大權還在您手裏。過去人們只關注毛的「義理」層面，而完全不知道或忽視、迴避他的「權力操作」層面，這對於了解毛和他主導的歷史過程，顯然是不夠的。我自認為在書中對毛的描述是客觀的，也講了他的「理想」層面，也許比重不多，但研究毛之「理想」的論著早已汗牛充棟，對一個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和世界，一直掌權到生命最後一息的大政治家，不僅要研究他的「思想」，還應研究他的「權力操作」層面，在那些「深掘義理」的書之外，我的書就作為一家之言，聊備一格，僅供參考吧。

（三）對於我的「思想矛盾」的問題，我同意蕭功秦的看法，他認為我書中所顯現的思想矛盾正是歷史事件本身的內在矛盾的一種映射。在這十年，我讀了更多的書，在這林林總總的讀物中既有歷史檔案文集、政治家的回憶錄，還有文學家的雜感、詩歌，新聞記者的報告等等。隨著互聯網的發展，我還閱讀了許多民間「小人物」的歷史。我讀它們都圍繞一個主題，那就是思考「革命」、「解放」、「自由」、「人性」的意義。我想說的是，這場思考持久、艱辛、充滿困惑。我的基本觀點沒有改變，我仍然認為，二十世紀上半葉開展的中共革命和國民黨領導的國家近代

化過程，都對中國的民族獨立和社會進步作出了重要貢獻，而其中間產生的左、右極端主義既和兩黨的領袖及領導層的認識水平、知識結構、文化素養有關，更是他們及國家所面臨的內外環境和歷史條件的產物，作為後人，我們應在新的起點上總結歷史，吸取教訓，將前人的成就、犧牲和失敗轉化為今天推動社會進步的有價值的思想遺產。

(四) 遇資州說，延安整風的成功關係到中共革命的勝利，他說得不錯，我在書的「後記」中說過，「從中共革命奪權、推翻國民黨統治的角度觀之，延安整風運動對於中共革命成功助力巨大，但是延安整風運動中的某些概念、範式以後又對中國的發展和進步產生若干消極作用，極左思想、權謀政治匯溪成流，終至釀成建國後思想領域一系列過左的政治運動直至文革慘禍」，如果不是因為這一切與老百姓有著密切的關係，我是不應加以置評的，即如遇資州所說，共產黨「整風」如果只整黨內，「幹卿何事？」問題是，「整風」因有效而形成範式，建國後馬上就整到黨外，從「思想改造」，到「審幹肅反」，……最後到「文革」，一直整到普通百姓，都要強制接受「規訓」，那就不對了。

(五) 遇資州提到，為什麼當年在延安挨整的人以後又整人？在毛時代，這確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很值得研究，我自己曾長時間思考這個問題。我的看法是經過延安整風，那些革命知識分子獲得了雙重身份：一方面，他們是革命者，是戰士，是毛話語的宣傳者，他們擔負著鼓動、教育群眾的重任；另一方面，他們又是帶有「舊階級和舊意識的烙印」，「思想需要不斷改造」的群體。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心悅誠服地接受了自己的這種新身份，並從中獲得了歸屬感。新中國成立後，延安知識分子成了全國宣傳、文化、教育領域的領導者，作為解放者，他們自豪而自信，多數人當了官，從原先的兩重身份回到一種身份，成了監督別人進行改造的領導者和整人者，很多人在這個轉變過程中，沒有任何道德和心理障礙，就把當年他們所蒙受的那套方式，再施加給原國統區的人們，直到革命深化，他們被更革命的人打倒。

(六) 遇資州說，共產黨當然左，或者「極左」，可以指望有不左的共產黨嗎？應該說，他的這些話頗有震撼性。在那個革命的年代，共產黨當然是激進的，可是黨的文宣同時也吶喊民主和自由。今天的人們或許知道政治是複雜和殘酷的，然而在當年，對於許多人來說，在人間建立一個烏托邦的理想國，還是有強烈的吸引力的。依照他提供的那套的邏輯，我們沒有任何理由期待革命有崇高的人性價值，更不能對革命領袖的個人品格抱任何期望，我們只能圍著篝火跳舞，慶賀那些黨內鬥爭的失敗者、被冤死者升天，因為一革命就必然「極左」，而搞「權謀」也是正當的。可是如此這般，最後是什麼結果呢？只能是遇資州說的：「無論怎麼選，我們都是輸家，都會為虛無的現身埋下伏筆。」遇資州的質疑，可能永遠難以回答，因為它涉及的更深邃的歷史哲學層面下的人性、革命、政治、暴力、毀滅的道德基礎的問題。

眾所周知，思想的駁詰、學術的爭論有賴於一個場域，這就是存在著一個公平、開放的學術平台，其前提是學術書籍的自由流通。雖然本書所談論的歷史事件已過去六七十年，但還被認為是涉及「敏感」，及至內地某些著名圖書館也是有我書的收藏，而不提供外借和館內閱讀。儘管如

此，國內外、境內外一些高校的一些學科將我的書列為教學參考書，網絡上也經常有我書的片斷的轉載，甚至還出現了幾種電子版。在中外出版的一些學術書籍、論文中，也有許多對我書的引用。

由於本書不能進入內地，2003年有讀者帶入被海關沒收，還打了一場官司。前幾年內地出現了我書的大量的盜版，遍佈全國各地，有讀者寫信或電話告訴我，在北京和西部的寶雞都見到我書的盜版，我自己在上海街頭也多次發現。對於這種侵權行為，我自然不滿，但無能為力，非常無奈。

對《紅太陽》的修訂構想

有關修訂，我的基本想法是這樣：

- (一) 將保留書的原來的結構。
- (二) 我的基本觀點沒有變化，個別地方可能會有一些調整。
- (三) 將會修訂一些錯訛之處，包括個別史實和文字方面的錯誤。
- (四) 主要是補充一些新的資料，使之融入到有關敘述中。這十年來新出現的資料不僅沒有推翻我書的觀點，反而從不同角度印證了我書中的看法。2003年俄羅斯解密的有關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的檔案，內含大量的電報原件，其中多數為首次公開。這些電報反映了1931–1937年中共中央、臨時中央政治局、蘇區中央局，博古、毛澤東、周恩來的關係和矛盾，在相當程度上印證了我書的判斷。1986年楊尚昆的一次談話，涉及上海臨時中央、中央蘇區以及延安時期的許多重大事件，其精神和我的書不謀而合，完全印證了我書的觀點。另外，博古後人的新著涉及上海臨時中央、中央蘇區、長征時期的毛澤東、周恩來、博古、張聞天等的關係，其中某些內容也印證了我書的判斷。對於這些新材料，我都會進行整理，將其吸取到修訂本中。

(五) 我在修訂本中，還將使用一些經歷延安整風運動的老同志及他們的後代贈送給我的資料，例如：西安的張宣的回憶錄、鄭州郭曉棠家屬保存的有關郭曉棠與河南「紅旗黨」冤案的材料，以及李新回憶北方局整風的資料等。總之，我會對近十年披露的各種資料進行認真考辨，並吸取到本書的修訂本中。

以上只是修訂的初步計劃，重拾十年前舊作，「萬千心事難寄」，在下一步的修訂過程中，我會把對那些歷史上的人和事的新研究、新感悟融入書中。總之，我希望我能把修訂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使得本書可以更充實一些，完全地復原歷史是不可能的，但是可以通過進一步發掘資料和細緻的研究，盡可能地去接近歷史事實，這是十年前出版本書時我的心願，現在仍然是我的目標，我會繼續努力。▲

■ 編者按：此篇原文約一萬字，因版面安排關係，現刪節至五千字，當中有關何方先生對《紅太陽》一書的評論，以及高華教授的詳細回應，均未能刊出。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09年10月號（總第115期），觀看全文。

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引起全國億萬群眾的熱情參與。文革研究者一般都認為參與這場運動的群眾是「不理性」的；他們受到毛澤東超凡魅力的蠱惑，做出種種瘋狂的行為。王紹光卻打破傳統的說法，認為文革參與者的行為大多是理性的，即使具有超凡魅力的領袖也難以左右其進程。

瘋狂歲月裏的理性選擇

訪王紹光教授談他的文革經歷和文革研究

編 編輯

王 王紹光

編 王教授，請談談你在文革時候的經歷。

王 1966年，文革爆發，我十二歲。批判鄧拓、吳晗、廖沫沙「三家村黑店」時，我還在武漢市三元里小學五年級畢業班。當紅衛兵運動興起時，我已進入武漢市實驗學校讀初一。這使我有機會親身投入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幹，誰幹？」在這種豪氣沖天的口號激勵下，我打起背包，與幾個小夥伴到首都北京串聯。在北京期間，我們沒去頤和園等名勝景點遊玩，而是認認真真地花了不少時間在街頭抄大字報，「取」革命之「經」。

從北京返回武漢已是秋天，學校裏成立很多組織。我申請參加「紅衛兵」，但也許是因為成份不夠「過硬」，沒被批准。正好「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武漢地區總站」招兵買馬，我就入了他們的伙。同時，還跑到武漢二中參加了一個名為「國際紅衛兵」的組織。但那時畢竟只是個初一的小男生，沒人把我當回事。

為了過「革命」的癮，我和幾個小夥伴回到三元里小學，弄到油印機、鋼板、蠟紙和紙張；然後又到已被「砸爛」的市委大樓佔了一間辦公室。於是我們自己的「武漢市毛澤東思想小八路」誕生了，隔幾天我們就刻印一批傳單。最讓我們興奮的是在鬧市區向人群撒出傳單那種感覺。看到人們紛紛搶那從天而落、五顏六色的傳單時，我著實過了把電影中那種革命工作者的癮。

不過好景不長，家長們很快發現了我們早出晚歸的秘密，加上他們此時自身難保，於是我們被趕回了家。

編 對此後武漢地區的文革，你有什麼見聞？

王 此後兩年中，武漢文革高潮迭起，「二八聲明」、百萬雄師、1967年6、7月的大規模武鬥、「七二零事件」、大聯合、三結合、鋼新之爭、成立各級革委會、1968年夏天的搶槍和武鬥……。這一切令我這個十三、四歲的少年眼花繚亂。我既是這些事件的觀察者，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參與者。

1973-1976年，武漢文革派系鬥爭的戰火重燃。那時，我已成年，在近郊堤角中學任教。每天下班之後，我都會騎著自行車趕赴大字報集中的水塔、民生路、武勝路、航空路等地，打聽最新進展。這幾年留下的日記和與友人的通信，日後也成為我研究文革的素材。

編 那麼你為何會走上研究文革的學術道路？

王 1977年8月，華國鋒在中共十一大上正式宣布文革結束；同月，鄧小平決定恢復高考。這樣，我幸運地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成為「七七級」的一員。北大畢業後，教育部公派我到美國康奈爾大學留學。

1985年，我通過了博士資格考試，下一步就是寫博士論文了。寫什麼呢？出國前的打算是以研究西方政治為主攻方向，但在美國待了幾年後，卻覺得用學到的新方法研究中國政治更有意思。於是，我馬上想到了自己親身經歷過的文化大革命。

以毛澤東為中心研究文革，是史學中長期佔統治地位的「偉人史觀」的表現。誰也不能否認毛澤東在文革中的關鍵作用，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沒有億萬人民的參加，文革就不成其文革了。我決定將分析重點放在群眾身上：老百姓為什麼會投身文革？群眾為什麼會分化成水火不容的派系？大眾參與的行為模式有什麼特點？這些便是我所關注的問題。

編 你是用什麼方法來研究群眾的行為呢？

王 我決定以一個城市作為分析單位。這個城市當然就是我所熟悉的武漢。為了收集論文資料，我於1986年返回武漢。在武漢市圖書館和湖北省圖書館我足足蹲了三個月，每天早出晚歸。中午圖書館休息，我就在附近轉轉，思考問題。圖書館沒有文革小報目錄，館員們每天上午捧出一大摞小報，他們拿出什麼，我就看什麼。館裏規定不許複印，找到有用的資料，只能一個字一個字抄在筆記本上。

之後，我將重點放到了人物專訪上。幾個月裏，共採訪八十多人，包括武漢文革時期各大派的核心人物二三十人。人物專訪讓我了解到不少文字資料所無法提供的內情。

最後，論文寫成。我要達到的目的有二：一是系統地論證我對文革的解釋；二是替武漢寫一部地方文革史。

編 你的論文提出了什麼新的學術見解？

王 我對文革的解釋很簡單：在瘋狂的表象下，文革參與者實際上是理性

的。這個解釋基於文革期間自己的觀察：一個人參加造反派還是保守派幾乎是可以預測的。我當然並不否認文革中人們的行為有瘋狂的成分。這種瘋狂與他們對毛澤東的崇拜分不開。用韋伯（Max Weber）的說法，毛澤東屬於那種有超凡魅力的領袖（charismatic lead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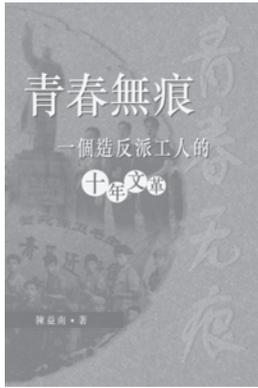
問題在於，韋伯也好，其他學者也好，當談到超凡領袖現象時，他們似乎都認為這類領袖的追隨者必然會喪失理性分析能力。但文革參與者並不是這樣。如果他們真是完全喪失了自我，只會盲目地按「最高指示」行事，文革進程決不會亂到連「偉大領袖」也難以駕馭的地步。我自己的觀察以及對幾十人的訪談都證明，文革參與者在涉及自身根本利益的問題上表現得非常理性。

文革這個個案說明，超凡魅力型領袖的追隨者可以同時既是瘋狂的也是理性的。這就需要對韋伯有關超凡魅力領袖的理論稍加修正。我認為個人崇拜有兩個向度：一方面，崇拜者對偶像充滿了信賴、敬畏，甚至有願意為之獻身的情感；另一方面，他們又把偶像作為認知的對象，試圖理解偶像發出的種種信息。處於不同社會地位的人對同一信息的解讀有可能截然相反，解讀過程便是理性發揮作用的過程。文革中各派大打「毛主席語錄戰」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情感向度可以解釋為什麼毛澤東的崇拜者會有瘋狂的行為，而認知向度可以用來解釋為什麼他們能在個人崇拜的大環境下進行理性選擇。

除了論證文革參與者是理性的以外，我還試圖解開一個理論上的疑團。熟悉曼瑟爾·奧爾森（Mancur Olson）《集體行動的邏輯》一書的朋友們都知道，理性的人並不一定會因為具有共同利益而參加集體行動，他們更可能採取「搭便車」（free-riding）策略。這樣一來，如果我們說文革參與者真是理性的話，就必須解釋文革中的種種集體行動為什麼會發生。通過對比各種「理性選擇」理論和深入分析文革這個實例，我發現狹義的理性選擇理論難以解釋文革中的群眾行為，只有將理性的假設條件有限度地放寬，才能比較好地解釋群眾為什麼參加文革、在多大程度上捲入派性鬥爭、在什麼條件下訴諸武力、何時退出運動。

編 謝謝王教授接受我們的訪問。相信學界對「文革研究」這個課題，還會陸續有新的發現。▲

▼ 本文改編自王紹光著：《超凡領袖的挫敗：文化大革命在武漢》（2009）中文版序。



文革結束逾三十年，中國官方的態度雖然是「徹底否定」，但同時卻將文革研究劃為學術禁區，不許討論，以致學術界有「文革在中國，文革學在外國」之嘆。作家韓少功為陳益南的《青春無痕：一個造反派工人的十年文革》撰寫的序言，對「文革為何結束？」這個學術界較少探討的問題，有一番見解，發人深省。

文革為何結束？

■ 韓少功

對於文革產生的原因，社會主流似乎已有共識。有人會提到中國的專制主義傳統，還有人會提到斯大林主義的影響，並由此追溯到俄國大革命和法國大革命的是非功過。更多的人可能不會這樣麻煩和耐心，乾脆把文革歸因於「權力鬥爭」或「全民發瘋」，一句話就打發掉。

我們暫不評說這些結論，但不妨換上另一個問題：文革為何結束？這裏只說及思想政治層面的兩點：新思潮的誕生和舊營壘的恢復。

新思潮誕生的三種情形

1976年以四五天安門運動為代表的全國抗議大潮，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民意的厚積薄發，顯現出文革大勢已去。在此之前，1973年廣州李一哲的大字報呼籲民主，1974年張天民等人就電影《創業》問題「告御狀」，此類體制內外不同的抗爭早已多見。從近些年來一些最新披露的資料來看，當時全國各地都活躍著眾多異端思想群落。陳益南先生著《青春無痕：一個造反派工人的十年文革》，也提供了一份生動而翔實的親歷性見證，記錄了一些工人造反派的心路歷程，記錄了他們思想上的迷惘和最終清醒。這些都顯示出，當年的天安門事件並非孤立事件，其背後有廣闊而深厚的民間思想解放運動，有色彩各異的思想者組成了地火運行。

新思潮以民主、自由、法制、人道、社會公正等等為價值核心，其產生大致有三種情形：

一是「逆反型」，表現為對文革的硬抵抗。在文革的極權體制和政治狂熱之下，遇羅克、張志新、林昭、劉少奇、賀龍、彭德懷一類冤假錯案屢屢發生，人權災難層出不窮，迫使很多人進入了對政治和社會體制的反

思。包括共產黨內不少高層人士，在文革前曾是各項政治運動的信奉者與追隨者，習慣於服從權力的指揮棒，只是因自己後來身受其害，有了切膚之痛和銘心之辱，才有各種沉重的問號湧上心頭。

二是「疏離型」，表現為對文革的軟抵抗。當時沒有直接受到過政治迫害的更多人，也對文革隔膜日深和懷疑日增，是因為文革妨礙了他們的個人生活欲望。這些人一般沒有強烈政治意識和直接政治行為，但對文革形成了更為廣泛而巨大的價值離心力。湖南著名的「幸福團」由一些幹部子弟組成，尋歡作樂，放浪不羈，聽爵士樂，跳交誼舞，打架鬥毆甚至調戲女性。作家王朔在《陽光燦爛的日子》裏描寫的一夥軍幹子弟，也接近這種個人主義、頹廢主義、虛無主義的狀態。這證明即使在當時執政營壘的內部，禁欲教條也被打破，世俗興趣逐步回暖，加速了文革的動搖和解體。

三是「繼承型」，即表現為對文革中某些積極因素的借助、變通以及利用。文革是一個極其複雜的歷史現象，從總體上說，具有革命理想和極權體制兩種導向互為交雜和逐步消長的特徵，兩者一直形成內在的緊張和頻繁的震盪，使解放與禁錮都有異常的高峰表現。1966年，毛澤東在主要政敵失勢之後仍然發起運動，是「權力鬥爭」說難以解釋的。他倡導「繼續革命」和「造反有理」，「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在隨後兩年裏甚至使大部分國民享受了高度的結社自由，言論自由，全國串聯，基層自治，雖然其最終目標至今讓人疑惑不解和爭議不休，但民主的激進化程度足以讓西方人士望塵莫及。他後來政策進退失據，反覆無常，愈來愈陷入極權弊端的困鎖，但就全社會而言，反叛精神和平等目標的合法性還是得到了曖昧的延續，如大字報等手段獲得法律保護，「反潮流」精神得到政策鼓勵。這一極為矛盾的狀態和過程，給結束文革留下了活口。

從這一點看，文革不同於一般的極權化整肅，比如1968年全國大亂被叫停以後，異端思潮仍在全國範圍內繼續活躍與高漲，與五十年代末期「反右」以後的萬馬齊喑大有區別。同是從這一點看，對文革的反對，也不同於一般的西方式民主，而是一種根植於中國歷史和現實中的中國特產。遇羅克、李一哲、楊曦光（楊小凱）、張志揚等知名異端人物的經歷證明，他們既有「逆反型」狀態，從文革中獲得了負面的經驗資源；又有「繼承型」狀態，從文革中獲得了正面的思想資源——在他們的各種文本中，紅衛兵或造反派的身份背景隱約可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遺傳明顯可見。

舊營壘的恢復

文革中的某些激進派曾抱怨毛澤東沒有「徹底砸爛舊的國家機器」，對「官僚主義階級」過於軟弱和姑息。這從反面泄露出一個事實：由黨政官員以及大多知識分子組成的上層精英群體，當時雖然受到了重挫，但並沒有消滅，甚至沒有出局。即使是下台的黨政官員和知識分子，在1972年以後，經過一段時間下放勞動，也大多陸續恢復工作，重新進入了國家機器。這些富有政治能量和文化能量的群體在紅色風暴之下得以幸存，是日後結束文革的重要條件。

從事後的回憶來看，上層精英們談得最多的文革經歷是「下放」——這包括黨政官員和知識分子貶入下層任職，或者直接到農村、工廠、「五七幹校」參加學習和勞動。近兩千萬知識青年的上山下鄉也是與此相關的放大性安排。

「下放」無疑具有懲罰功能。當事人的社會地位降低，還有歧視、侮辱、恐懼、困苦、家人離散、專業荒廢等傷害也往往隨之而來。這種經歷大多逼出了當事人對文革的合理怨恨，成為了他們日後投入抗爭的心理根源。在另一方面，除了少數人遭遇遣返回鄉或拘捕入監，就標準定義下的「下放」者而言，其絕大多數保留幹籍甚至黨籍，保留全薪甚至高薪。他們仍然構成了潛在的社會主流，不過是在重獲權力之前，經歷了一次冷凍，接受了一次深入底層的短期教育。當局似乎想以此調整社會階層結構，強迫上層精英與下層民眾融合，嘗試革命化「五七道路」的可能。

一打民意牌，二打實踐牌

但與當局的估計相反，民眾不但沒有使「下放」者受到擁護文革的再教育，反而給他們輸入了懷疑和抵觸現實的勇氣。當精英從民眾那裏一批批歸來，當他們的名字開始陸續重現於報刊和會議，文革的反對派實際上已經出爐成劍，已經形成了體制內的力量優勢，而且遍佈政治、經濟、文化、科技、教育、外交等各種重要崗位。此時新思潮已經入場，新中有舊。舊營壘已經復位，舊中有新。各種社會條件出現了複雜的重組，貌似強大的文革已成殘破的蛹殼。一旦時機到來，改革領袖就可以順從和借重民意，以實現中國的四個現代化為號召，以四五天安門運動為依托，第一打民意牌，第二打實踐牌，從而形成馬克思主義化的巨大道德威權和政治攻勢。

在這一過程中，他們沒有另起爐灶，而是利用現存制度資源和制度路徑。比方逮捕「四人幫」和挫敗上海方面的割據圖謀，是利用「下級服從上級」的集權原則——華國鋒是當時最高領導，全黨全軍全國都得服從。比如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則依據「少數服從多數」民主原則——「凡是派」當時儘管掌握了黨、政、軍幾乎所有的最高職位，但不得不尊重全會多數人的意志，向務實改革派交出實權。

這一套「民主集中制」，是一種時而集權時而民主的彈性做法，與其說是制度，不如說更像是制度的未成品，有時甚至是非制度的應急運動。如果說它曾被有效地用來應對過救亡和革命的難局，但並沒有阻止過文革災難的發生，最終還出現了強權化和極端化的惡變，讓人們餘悸難泯和暗慮難消。因此，舊營壘在成功結束危機以後，如果還要繼續往前走，如果要承擔一個人口大國全面振興的全新使命，就不得不面對制度改造和制度創新的巨大難題。

這個難題留給了未來。

不難理喻的「文革」

徹底否定「文革」，是多年來的官方政策和主流觀念，自有不算恩怨細賬

和調整全局戰略的好處。換句話說，這種否定如果意在根除極權體制及其種種弊端，那麼再怎樣「徹底」也許都不為過。即使當事人有點情緒化，也屬於人之常情。但這樣做如果只意味著牽就於思維懶惰，意味著劃定學術禁區，對十年往事格諱勿論、格禁勿論、格罵勿論，那麼一種妖化加神化的兩極敘事，一定會造成巨大的認識混亂和認識隱患。長長十年中與極權關係不大的事物（如惠民的創制和建設），對極權給予磨損、阻滯、演變以至克服的事物（如啟蒙的民主和革命），就可能成為連同病毒一起滅亡的寶貴生命，而結束文革的生動過程和歷史意義就會永遠空缺。這種歷史上似曾相識偏執論競賽並不光榮。它不僅會給某些空幻和誇張的紅色「懷舊」之潮伏下誘因，更會使人們在西方冷戰意識形態面前未戰先亂，自我封嘴，盲目跟潮，喪失自主實踐的能力。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文革長久處於不可理喻的狀態，就會成為一截粗大的絕緣體，無法接通過去與未來。這塊絕緣體一定會妨礙人們認識文革前半個世紀的革命——文革就是從那裏逐漸生長出來的；也一定會妨礙人們認識文革後的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文革是後續歷史不可更換的母胎，孕育出後來各種出人意料的成功和突如其來的危機。

當中國正成為一個世界性熱門話題之際，文革是繞不過去的，更不應成為二十世紀以來國情認知迷宮前的一把鏽鎖。▲

▼ 摘自韓少功為陳益南：《青春無痕：一個造反派工人的十年文革》（2006）所寫之序言，內容有刪節。



《周恩來的政治生涯》英文版原書封面

無論在政治、軍事、外交和文化上，周恩來都有卓越的貢獻，贏得了中國和世界人民的敬仰。但是，迄今官方對周恩來的評價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只談他的功勳，而諱言他做的錯事壞事。這樣就使周恩來的形象失真。《周恩來的政治生涯》作者聚焦周恩來的政治活動，特別是他與毛澤東的關係，有獨到的見解。

周恩來的真實形象

■ 芭芭拉·巴努茵 (Barbara Barnouin)、余長更

在周恩來 (1898–1976) 誕生的時代，中國正發生著極其深刻的變化，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外來挑戰。周恩來幼年時，受的是以儒家價值觀為基礎的傳統教育，塑造了他的品格和個性，使他成長為一個有著強烈責任感、自律、謙遜，並隨時準備妥協的人。這些性格大大影響著他處理問題的態度，使他日後成了一名極佳的「調停者」。他在天津上中學。天津是從海上進京門戶的城市。他是當時最現代的教育制度下，最傑出的教育家之一張伯苓的學生。張伯苓使周自信能夠擔當把中國建成重新受到國際上尊重的強國這一重任。

二十歲出頭就遠遊日本和歐洲的經歷，也使周恩來的思想受益匪淺，培養了警惕性和靈活性。反過來又使他接受馬克思主義，把這種主義當作一種能改善人民的社會和經濟狀況，乃至救國並實現社會變化的理論。

周作為革命者的生涯開始於巴黎。1921年他在巴黎組織中國青年加入共產黨，當時共產黨在中國境內尚未誕生。也是在巴黎，他跟政治志同道合的中國人形成了一些重要的社會關係網。這些關係伴隨他終生。1924年回國後，他立即加入向當時政權挑戰的行動中心。三年後，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黨政府公開與共產黨決裂，周成為共產黨政治局委員之一。這就是他畢生作為中國共產黨主要領袖之一的開端。

甘當二號人物

長征期間，毛澤東開始向中國最高領袖和思想家的地位上升，與毛的關係就成了周恩來政治生涯的主要決定因素。當毛逐漸坐穩了最高領袖的交椅後，這兩位領導人之間在長征以前的分歧也逐漸沉澱下去。同時，周簡直就是謙遜的化身，他表現得毫無覬覦更高職位的野心。許多事例表明他甘當二號人物，他認為革命事業比當革命領袖更重要。他不僅能

芭芭拉·巴努茵，瑞士日內瓦國際研究院亞洲中心研究員。

余長更，1960及1970年代在中國外交部任職。

為他的事業而退居次要地位，還能夠忍辱負重。周曾經說過：「為了我們的革命，我們可以扮演如夫人的角色。必要時，甚至可以當妓女。」

在他政治生涯的早期，對於調解不同意見，斡旋同志間的對立方面，周就表現出突出的才幹——這種才幹在後來的歲月中更加發展，而且往往都發揮了極好的作用。然而他也具有馬基雅維里式的精明，一個以共產主義事業的名義不擇手段的人。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他還是國民黨政府裏一個溫文爾雅的共產黨代表的時候，他的辦公經費基本是國民黨給的。但這並不妨礙他所能使用的各種手段反對國民黨，並從其他渠道籌款。為此，他組織並親自指揮秘密特務活動。為了積累額外的經費，他開辦了資本主義的企業，而且也毫不猶豫地推動生產和銷售鴉片，以籌集活動經費。

「在周身上就是挑不出任何缺點」

四十年代黨的領導機構改組的時候，周是共產黨中央的核心人物之一，後來又是共產政權的核心人物。他在黨內的地位是第三號領袖，而且畢生保留著這一地位。他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到1976年辭世，一直是政府總理，同時兼管外交事務。雖然他對革命，特別是對國家行政的貢獻僅次於毛澤東，但從來都沒有被看作毛的潛在接班人。

儘管如此，他深受國內外許多人士的愛戴，人們視他為明智而有才華的政治家、有領袖魅力的革命者、幹練的行政長官、成功的談判者、高效率的組織者，乃至能幹的調停者。

基辛格特別鍾情於周的智慧 and 天賦，形容他「無論在哲學、記憶、歷史分析、計謀還是幽默巧妙的應答方面都得心應手」，並且說他是「我見到過的最令我佩服的兩三位政治家之一」。另一位給他寫傳記的作家韓素音甚至公開聲稱，儘管她曾努力要挑周的毛病，但在周身上就是挑不出任何缺點。許多中國人到今天還崇敬他，尊他為二十世紀中國最有人情味的領袖之一。

但是周也有批評者。通俗的說法稱他為不倒翁，推一下擺過去又總是擺回來，意指他在政治上是個機會主義者。在複雜的政治形勢下，他往往迴避明確表態，而變得躲躲閃閃、模稜兩可，有時不可思議。

很明顯，在政治上，周具有一種求生的天賦。他好幾次死裏逃生。尤其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充滿自相殘殺的權力鬥爭，他終其一生都能在政治上存活下來，保留在權力中心的地位，確實很了不起。他生命的最後十年，正值文化大革命，生存環境更加險惡。那時，毛已經確立了神的地位，對誰也不在乎。毛的妄想症和權迷心竅自大狂，使他要求下屬對他只能逢迎，凡被懷疑不忠的人都給清洗掉，搞得整個國家陷入狂亂。周的儒家教養、小心謹慎、井然有序、守紀律和遵守等級差別等，使他同這種狀況格格不入。但是他對毛的忠誠和自我保護的需要，使他接受了這種狀況。當他覺得追隨毛的熱情似乎還不夠時，就自我批評說對毛的思想「理解差」，而表現出對他私下裏厭惡的那種勢力的妥協，但背地裏他把這叫做「地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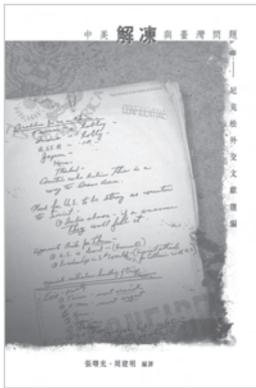
這一時期裏他的政治地位幾度受到嚴重威脅。但是，借助於毛，他站住了。在整個文革期間，高層領導中其他人都倒了，而他是唯一站住的。他調整自己去適應毛的最無道最荒唐的政策種種變化，卻不管這些政策多麼有害，使多少人成為犧牲品。他支持過，至少口頭上支持過迫害老幹部，其中很多是他的老戰友。他吹捧過毛的小集團，特別是他的妻子江青。也有一些他迫害別人的例子，似乎是出於報復欲。

有人說，他沒有選擇的餘地——政治家不掌權就實現不了他的目的。周要是違抗毛的激進政策，他無疑也會遭到他的許多同僚們一樣的命運。不過也有人說，實際上是周支撐了毛的政權，沒有他整個國家早就垮台了。很清楚，周努力使這個國家在逆境中漂浮也是符合毛的意圖。儘管他害怕文革的混亂妨礙國家行使其職能，他卻心甘情願地幫助毛貫徹他的政策。毛對此心知肚明，因此每次在他的這位總理政治上受到威脅的時候，都把他解救了。

自從鄧小平在七十年代後期當政以來，中國共產黨的一個主要目標就是維護它那被文革大大削弱了的聲譽。在那以前，毛一直是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研究的重點。文革後毛主義聲譽下降。要為這個已經不受信任的黨樹立一個新楷模，黨領導不能不另找一個比較莊重的人來象徵這個黨的偉大和絕對正確。毛推行的無數災難性的政策，從大躍進到文化大革命已經不能再代表這個黨的美好時光，但是周恩來可以。他被樹立為「新中國」無可指責的英雄。

現在有很多著作讚美周對共產主義事業的貢獻，他對政治的人道主義態度，他的好心。本書試圖在這裏補充一個真實的周的畫像。周在政壇上的地位自然給他帶來很多榮耀。有的作者寫起來好像他是在一個沒有毛澤東的環境中起著作用，使他至高無上。當然不是這麼回事。在周（和其他領導人）的政治生涯中，毛一直存在，而且無所不在，以至於寫周不得不提到毛。如果不提，那是無視歷史事實。周以獻身一個事業開始他的政治生涯，卻以待奉一個暴君而告終。▲

■ 摘自芭芭拉·巴努茵、余長更合著，馬繼森譯：《周恩來的政治生涯》（2009），引言部分，內容有刪節。標題為編者所加。



1999年4月，美國國家檔案和文獻局開始解密美國國務院檔案，當中「尼克松總統文獻」的文件，涉及1972年中美關係正常化——或稱之為「解凍」——的全部進展，對我們了解尼克松政府當年對華戰略決策過程，提供了最有價值的原始文獻。這裏節錄部分精彩片段，以饗讀者。

尼克松與周恩來就臺獨問題交鋒

尼 尼克松 周 周恩來 基 基辛格

尼 對於臺灣，無論我們在這兒達成怎樣的共識，我不相信我們的部隊永遠駐紮在那裏符合美國的安全利益。正是出於這個考慮，我的目標——我想我們現在的會談可以用這個特定詞了——是撤出我們所有的部隊，並非只是三分之二的部隊，而是所有的，包括剩下的三分之一。這是一個我可以實現的目標。

現在，總理先生大概能夠理解我為什麼需要這樣說，這是為了更好地爭取國會的認可。也就是說，說法上必須和所謂的「尼克松主義」一致，當然，我知道總理先生不贊成我的那個主義。正是由於這個主義，我們得以在韓國減少駐軍。當然，韓國的情況特別，因為她部分地與日本相關，她與臺灣不一樣。我想我將如何做的問題，總理先生，關係到我如何處理我的公共輿論問題。一旦我能解決我們介入越南的問題，就會將三分之二的兵力撤走。此外，我的計劃是，在我仍然大權在握的期限內，將剩餘的三分之一兵力全部撤走。但是，在明年一月之前，我無法做到。我需要四年時間。

回到美國後，如果有人問我是否與總理先生就完全〔從臺灣〕撤軍問題做過交易的話，我會說「沒有」。但是，我現在告訴總理先生，這是我的計劃。如果我們能一步步地撤軍，我就可能發展支持的力量，最終獲得國會對這個行動的批准。

我同時也會試圖讓公共輿論接受——我也希望你們的公共輿論不會受到損害——我們已經不需要在臺灣駐紮部隊了。

我曾對毛主席說過，他不了解我，因此沒有必要相信我。但是，我那麼說的目的是希望我們之間建立完全坦誠的關係，以致除了出於各自利益的考慮，否則我們是不會做任何事情的。這是個很重要的觀點。在此，

我要向總理先生表達的是，他也沒有必要相信我。我已經決定的這項政策——我不需要任何紙上的東西——是基於我們自己的利益，也是基於我們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正常化的意願。正是出於這些考慮，我已經下決心，我們將在我所闡述的時間表內進行撤軍行動。

作為結束語，我簡單地說，我心中毫無疑問，我能夠做到，因為我了解政治，假如我得以逐步進行並最終實現的話。

就這些。

周 我們並非要求設定任何時間表。對此，我們也沒有提出過任何要求。關於「一個中國」的問題，〔你的〕「五項原則」中已經提到了。我非常看重總統先生提出的這些原則。

首先，你們希望和平解決臺灣問題，而且不會阻撓臺灣問題的和平解決。第二，在你們未撤軍前，你們會阻止日本軍隊開進臺灣。你們會盡最大努力去做——但這樣仍需要在日本駐軍。

尼 是這樣的。你是指我們在日本保持軍事存在時，還是指在臺灣尚未撤軍時？

周 是的，我指你們在臺灣尚未撤軍時。你們是否會在撤軍前阻止日本派兵臺灣？

尼 我將比你要求的更進一步。我們甚至會在我們撤軍後努力阻止日本軍隊進駐臺灣。

周 也就是說，你們還在日本保持軍事存在時？

尼 正是這樣。除非我們在日本保持軍事存在，否則他們〔指日本人〕不會理睬我們。

周 你說的第三點是，你們既不會支持或允許、也不會鼓勵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臺灣的臺獨運動。

基 是不鼓勵。「不允許」非我們所能。

周 不鼓勵？

尼 是的，是「不鼓勵」。

周 但是，你們應該說，在你們的軍隊駐紮臺灣期間，你們不允許在臺灣存在臺獨運動。這點很重要。

尼 在我們尚未撤軍前。

周 因為，你知道，甚至蔣介石都抱怨，是你們把彭明敏放走的。

基 事實並非如此。我提出此事是因為我和總理先生先前已經討論過這個議

題了。總統先生，如果你還記得的話，談話記錄中我是這樣對總理說的：無論是美國政府官員個人，還是美國政府機構，都不得直接或間接地鼓勵或支持臺灣獨立運動。如果他有〔我們官員支持臺灣〕的證據，請他將證據交給我們，我們會採取措施停止這些支持。

尼 在今天的會上，請允許我表達對這項承諾的確認。

周 我收到材料表明，彭明敏是在美國人的幫助下逃出臺灣的。這個人好像是基辛格博士的學生，賴肖爾先生。

尼 總理先生，蔣介石對此不高興，你對此不高興，我對此也不高興。但是，這件事與我們毫無牽連。

基 據我所知，那位教授（指彭）得以離開臺灣，是得到了美國的反蔣的左翼分子所為。

尼 蔣介石對我們提出了抗議。

基 阻止這件事的成功，對我們而言，政治上困難很大，因為那時我們之間尚未建立聯繫。我們曾試圖阻止此事。如果類似的事再次出現，我們大概可以完全阻止其成功。彭那時在瑞典，並非在臺灣。阻止他從瑞典進入美國是非常困難的。

總統先生，我還告訴總理，我們政府不會直接或間接地，或以任何其他形式，支持在美國的臺獨運動。假如他有我們政府支持美國的臺獨運動的證據，我們會阻止這些支持活動。

尼 我對這個承諾也表示確認。

基 我們所不能做到的是，一旦臺灣的臺獨運動即便在沒有我們支持的情況下仍發展起來，我們不能動用軍事力量去鎮壓他們。

周 可以理解。但是，蔣介石會去鎮壓他們。他也有力量這樣做。

尼 這也是我們所聽到的。

周 至於能夠找到怎樣的解決臺灣問題的方案，還是由你們兩位去考慮。只有先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才能召開全體會議進行討論。

尼 絕對是這樣的。

周 在我們解決這個問題之後。

尼 解決這個問題應該先在我們之間進行，而不是在大會上。

周 確實如此。▲



《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是西方學界對中共建國以來的發展歷程和取得的成就，作出深入分析和評價的高水準之作。作者邁斯納的見解是，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社會結果本質上是資本主義的經濟與社會。為何出現這種弔詭的現象？請看作者細緻而深入的分析。

中國社會主義實驗的失敗

■ 莫里斯·邁斯納 (Maurice Meisner)

兩種主義的矛盾

中國，這個在1949年前的一百年被西方人士輕蔑地稱之為「東亞病夫」的國家，現在擁有世界上最富有活力的經濟，重新成為一個世界強國。在過去的四分之一世紀裏，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以年均8%的速度增長，經濟發展長期保持這樣的速度，在現代歷史上絕無僅有，令經濟史學家瞠目結舌。

人們很輕易就忘記——許多人已經忘記或也許根本不知道——今日的中國是現代史上一場偉大的社會革命的產物。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是毛主義革命的頂峰，它是所有現代革命中規模最宏大、最受人民擁護，並且可能是最富有英雄氣概的革命。然而，它又是以深刻的矛盾、特別是以革命自身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衝突為其標誌；這種矛盾以多種怪異、晦澀的方式表現出來。但是，要理解革命後中國痛苦的歷史進程及其社會結果，就必須了解這種矛盾。

我在使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個概念時，不是指毛主義說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之間無休止的鬥爭這種令人誤入歧途的含義。同樣，在我看來，簡單地認為這種鬥爭意識反映在主要領導人的思想及其政治「路線」上的觀點也不足取。那些加入並領導中國共產黨的人（在1949年前，要冒巨大的個人風險）所以這樣做是為了實現社會主義目標，儘管他們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多種多樣，對以什麼方式實現社會主義目標的認識也不盡一致。

中國經濟的資本主義特徵

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主要矛盾，不是兩種不同形式的「意識形態」矛盾， 27

而是革命者的主觀目標與其所處的客觀條件之間的衝突。中國共產主義革命者的目的是實現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社會主義目標，正是這一理論教導說，社會主義不可能在經濟落後的條件下或在產業工人階級尚不成熟的國家裏實現。簡言之，馬克思主義教導說，中國不具備實現社會主義的基本物質和社會條件。因此，中國革命必然地只能限於「資產階級」革命，就是說，中國革命的社會結果將是資本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

在延安時期的鼎盛年代，毛在1940年寫的《新民主主義論》中，部分地承認了這些馬克思主義的限制條件。但在五十年代初期，為了在建設工業基礎的同時，加速實現對中國社會的社會主義改造，中國匆忙取消了「新民主主義」（或「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我要探討的，即是這種「社會主義改造」嘗試的歷史及其結果。

而我的結論是，這一嘗試是失敗的，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社會結果本質上是資本主義的經濟與社會。自從八十年代中期後，這種結果日益明顯——儘管為了（日漸式微的）意識形態宣傳需要，當局盡力論證所有政策及其結果都具有某種形式的「社會主義」，使結果模糊一點。

自1998年之後，中國經濟的資本主義特徵更加明顯。國有企業的私有化進程速度加快；國外投資急劇增長；能否取得盈利成為進行經濟決策最終的、唯一的判斷標準；經濟自由化的語言和標準支配了社會精神生活；社會福利銳減，社會經濟不平均等現象更為突出；《福布斯》雜誌發佈年度中國富豪排行榜。國內外都要求中國經濟遵守國際資本主義秩序的規則，並加以實踐，壓力愈來愈大。

土地改革為工業化提供資金

顯然，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現在導致的不是社會主義而是資本主義的結果。有人以此作為正統馬克思主義關於在經濟落後的條件下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觀點的佐證。有人則認為，如果勝利了的共產黨人在過去半個世紀，實行不同的政策、採用不同的方式，社會主義是有可能在中國實現的。

猜測如果歷史人物採取與他們實際做的不同的做法，歷史會變成什麼樣，這是沒有意義的。在這個問題上，人們只能遵從特里威廉（G. M. Trevelyan）的結論：「人就是他之所是，後世遲來的智慧對他不產生影響，他只做他做的事。」中國的社會主義實驗已被證明是失敗的，這就是事實。

然而，毛主義革命並沒有失敗。現在流行的看法是，毛主義革命其實大可不必進行，如果國民黨繼續掌權，那麼「現代化進程」也會產生出相同的社會和經濟結果，中國也會因此而避免革命所造成的流血和破壞。但是我認為，如果沒有共產黨領導的社會革命，就不可能在過去半個世紀裏取得這些積極的成就（這並不是要原諒或否認這個時代人的野蠻行徑）。這些成就包括在這片飽受外國野蠻侵略和軍閥混戰之苦的國土上，實現了民族獨立和政治統一。在長達一個多世紀的停滯、衰敗和人的巨大痛苦之後，獨立和統一是社會與經濟進步之首要的、最根本的前

提。政治上的勝利為共產黨國家取得其最重要的成就，即為1950年代初期的土地革命提供了保障。土地改革消滅了地主階級，使共產黨政權能夠調撥農村剩餘產品，為現代歷史上有記載的規模最宏大、發展速度最快的工業化進程提供資金。

中國的經濟成就與社會主義並無關係

除了口頭上的宣傳外，這些經濟成就本身與社會主義並無多大關係。一個長期分崩離析的帝國的政治統一、一個現代的獨立的民族國家和全國性市場的誕生、農村的前資本主義關係廢除、現代工業化的開始——這些全都是偉大的資產階級革命的典型產物，雖然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實際上並沒有資產階級的參與。

儘管在發展道路上人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並加以政治上的錯誤與罪行，中國和中國人民在後革命的轉變中獲得了巨大的成就。不久前還被視為亞洲最悲慘、最貧窮的國家之一的中國，今天可以宣稱是世界上強大的工業經濟實體之一，而且是迄今為止最有活力的經濟實體。

毛主義企圖使革命超越資產階級革命的局限性，然而徒勞無功。1978年，共產黨領導人開始進行「市場經濟改革」，實際上也是默認了這一點。由此出發，繼之是資本主義的高速發展——伴隨著資本主義發展所帶來的典型的經濟活力與社會瓦解。社會主義及作為其本質的民主先決條件，依然是中國懸而未決的歷史議題——也許會由未來幾代人來實現。▲

■ 摘自莫里斯·邁斯納著，杜蒲譯：《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2005），中文版序言，頁v-viii。內容有刪節。標題為編者所加。



今年是「六四事件」二十周年，當年學生和平集會，為何最後演變成軍事鎮壓，仍是個謎團。學者在努力發掘史料、尋找真相。趙鼎新的《國家·社會關係與八九北京學運》是其中之一，他從社會學角度分析八九學運的始末和影響。本文輯錄作者對六四前後十數天的描述及分析。

八九學運 走上軍事鎮壓之路

■ 趙鼎新

彭真：「有人正在趁機利用學生」

〔1989年〕5月19日晚，各路戒嚴部隊開始向北京推進，但立刻遭到學生和北京市民的阻截。僵持幾天之後，部隊不得不向郊區撤退。

既然部隊不能和平進駐北京，那麼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命令部隊不惜一切代價挺進。這項命令之所以遲遲沒有發佈，是因為當時中共政府還沒有做好充分準備。

首先，戒嚴開始之初，雖然多數高級軍官多少都贊同這項決定，但大部分中下級軍官和士兵絕對沒有想過要殺出一條通向天安門的道路，政府必須進一步說服他們。

其次，高層精英也需要贏得其他官員和社會精英對鎮壓政策的支持和理解。5月22日以後，政府為此召開了一系列會議，針對聽眾的不同，會議的側重點也各有不同。比如5月24日，楊尚昆在會見軍方高級將領時，著重強調的是學生在運動中提出的種種激進口號，並強調戒嚴得到了鄧小平的首肯、並獲得了長征老幹部的支持等事實。陳雲在同中央顧問委員會的老同志會面時，再三強調他們為打下這片江山而經歷的犧牲和磨難，並提醒他們注意，如果學生成功，中國「不僅有可能痛失十年改革的成果，而且有可能讓他們浴血奮戰才取得的革命成果毀於一旦」。而彭真在會見黨外精英時則強調：學生的動機是好的、建設性的，但他們處理社會問題的方式不對；政府對學生所提出的社會問題也很關注；但是有一小撮居心叵測的人正在趁機利用學生。由於中共最高層精英統一了口徑，愈來愈多的中下層領導人物也開始公開在報紙上表達了他們對戒嚴的支持。

然而，高層精英顯然仍然在考慮軍事鎮壓的代價，因此在這段時間裏他們仍然在通過官方或半官方渠道不斷與學生領袖溝通，試圖說服、甚至威脅他們主動撤離廣場。在這方面，可以列舉一些學生領袖的回憶為證。鄧小平的兒子鄧樸方曾派助手前往北京大學，他們對學生領袖常勁說，如果學生主動撤離廣場，不再堅持反對戒嚴，不再堅持推翻4·26社論，鄧樸方可以在事態平息以後力勸鄧小平退休。根據學生領袖李錄的說法，5月26日，有一個代表李鵬及政治局的人被派到天安門廣場勸說學生們離開。他告訴學生，戒嚴並不是針對他們的，軍隊不會傷害他們，運動結束以後政府也不會懲罰他們；但是，如果學生固執已見，堅持佔領廣場的話，武力和流血都是不可避免的。據張伯笠的回憶，政府和學生的最後一次接觸是5月30日下午在北京飯店進行的。李錄和張伯笠都去了，但沒有達成協議。最後，政府代表警告學生迅速返回學校，因為軍隊很快就要對廣場進行清場了。

政府扮演了「狗熊」的角色

這些努力表明，即使在戒嚴令發佈之後，政府仍然在努力避免流血衝突。這倒不是因為政府中改革派在此時還發揮著什麼特別的影響，而是中共高層的每個成員都很清楚軍事鎮壓的代價。

學生並沒有就此撤離，戒嚴總部則發佈了軍隊第二次推進的命令。軍隊再次遭到北京市民的強烈抵抗，整個過程艱難而血腥。但是這一次，由於中央決意鎮壓，再加上軍隊已準備充分，他們最終開進了天安門廣場。運動於是以悲劇而告終。

為什麼學生和北京市民完全不顧政府的反覆警告，而甘願冒著生命的危險去抵抗戒嚴部隊呢？許多因素在同時起作用。舉例說，在運動期間，國家已經多次採取強硬策略；但是，每次只要參加運動的人堅持立場，政府就會後退。既然政府在每次「英雄與狗熊」的遊戲中都扮演了「狗熊」的角色，人們總覺得政府還會再扮演一次。所以，在採訪中，一些受訪者對我說，甚至當有人中彈時，他們身邊的人，包括他們自己，都還以為那只是橡皮子彈而已；那一瞬間，他們沒有害怕的感覺。

然而，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政府與學生之間存在著所謂的「信息鴻溝」。首先，北京的學生和市民沒有構成一個統一的行動主體。一直到5月底，他們都更像是一群龐大的、無組織的烏合之眾；更重要的是，政府確實沒有把鎮壓的消息秘而不宣。事實上，政府曾多次通過公開和私下的場合，警告人們說政府已經失去耐心，鎮壓迫在眉睫，只是學生和市民並未對這些信息做出反應。在這裏，我將再次運用國家·社會關係模型，圍繞國家合法性的來源這個問題，對此做出解釋。

戒嚴令不能使學生和北京市民信服

前已述及，當趙紫陽的讓步策略未能奏效時，政府不得不回到強硬路線。但這一次卻不能僅僅依靠意識形態手段，因為4·26社論已經證明這一招非但無益，反而會觸怒學生。在意識形態抨擊和軍事鎮壓這兩種手段之間，對政府來說唯一可行的手段就是通過法律手段發佈禁令，亦

即戒嚴令。問題是，中共高層精英在過去並未把法律看成是對他們具有約束力同樣的社會契約的一部分，而只是將其當作實現意識形態和個人目的的工具。因此，法律的執行和闡釋會隨著意識形態的風向而不斷變換，一旦國家的意識形態合法性衰落，法律的權威也就隨即瓦解了。這樣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戒嚴令既不能使學生和北京市民信服，也不能向學生和北京市民傳達所欲傳達的信息，使之做出相應的理性選擇。最終，戒嚴令與4·26社論一樣，只起到了反作用。

至此，政府所有可以嘗試的手段都失敗了，唯一沒有用到的就只有強硬的軍事鎮壓了。在高層精英中，不管是改革派還是保守派，相信沒有人願意看到這樣的情況發生。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似乎已經是政府唯一可以用來阻止這場反對現有體制的大規模運動的手段。這一手段尚且有效，是因為一直到八十年代末，包括大部分軍隊高級將領在內的高層精英，仍然對他們為之獻身數十載的革命矢志忠誠；與此同時，他們仍然能夠牢牢地掌握對手下的軍隊的控制權。▲

▼ 摘自趙鼎新：《國家·社會關係與八九北京學運》（2007），頁207-209。標題為編者所加。

一葉知秋：清華大學1968年「百日大武鬥」

唐少傑 著

978-962-996-126-8 平裝 16 美元

二十世紀日本：從德川時代到現代

安德魯·戈登 (Andrew Gordon) 著 李朝津 譯

978-962-996-274-6 平裝 25 美元

中美「解凍」與臺灣問題：尼克松外交文獻選編 (參本刊頁24)

張曙光、周建明 編譯

978-962-996-246-3 平裝 49 美元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新詞語

李谷城 著

978-962-996-276-0 精裝 39 美元

978-962-996-258-6 平裝 25 美元

中國大陸政治術語

李谷城 著

978-962-201-505-0 平裝 16 美元

中國的基督教烏托邦：耶穌家庭(1921-1952)

陶飛亞 著

978-962-996-199-2 平裝 20 美元

中國社會：從不變到巨變(第二版)

劉創楚、楊慶堃 著

978-962-201-983-6 平裝 12 美元

中國近代史(上、下冊) (參本刊頁6)

徐中約 著 計秋楓、朱慶葆、鄭會欣 譯 茅家琦、錢乘旦 校

上冊：1600-1923年

978-962-201-987-4 平裝 19 美元

下冊：1911-1998年

978-962-201-988-1 平裝 19 美元

中國近百年人權思想

杜鋼建 著

978-962-201-916-4 平裝 18 美元

中國現代思想的起源：超穩定結構與中國政治文化的演變(第一卷)

金觀濤、劉青峰 著

978-962-201-919-5 平裝 16 美元

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

劉青峰 編

978-962-201-763-4 平裝 18 美元

文明的憧憬：近代中國對民族與國家典範的追尋

鮑紹霖 著

978-962-201-895-2 平裝 12 美元

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參本刊頁27)

莫里斯·邁斯納 (Maurice Meisner) 著 杜蒲 譯

978-962-996-173-2 平裝 21 美元

外交部文革紀實

馬繼森 著

978-962-996-067-4 平裝 18 美元

外交生涯四十年

何鳳山 著

978-962-201-435-0 平裝 17 美元

失落的一代：中國的山山下鄉運動，1968-1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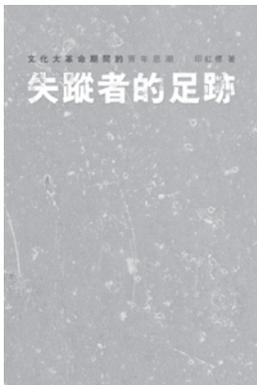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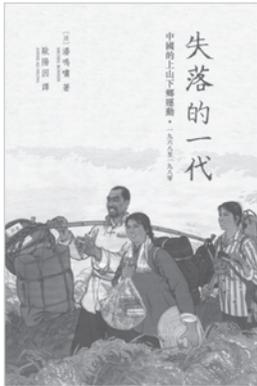
潘鳴嘯 (Michel Bonnin) 著 歐陽因 譯

978-962-996-391-0 平裝 25 美元

失蹤者的足跡：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青年思潮

印紅標 著

978-962-996-389-7 平裝 23 美元



民族主義與中國現代化

劉青峰 編

978-962-201-636-1 平裝 20 美元

仰天長嘯：一個單監十一年的紅衛兵獄中顛天錄

魯禮安 著 王紹光 校

978-962-996-250-0 平裝 23 美元

同床異夢：處理1989至2000之中美外交

藍普頓 (David M. Lampton) 著 錢乘旦 編校 計秋楓 翻譯

978-962-996-108-4 平裝 23 美元

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 (參本刊頁2)

戴晴 著

978-962-996-401-6 平裝 25 美元

自由主義與中國近代傳統：「中國近現代思想的演變」研討會論文集(上)

劉青峰、岑國良 編

978-962-996-072-8 平裝 15 美元

自由主義與中國現代性的思考：「中國近現代思想的演變」研討會論文集(下)

劉擎、關小春 編

978-962-996-073-5 平裝 13.5 美元

形形色色的造反：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

徐友漁 著

978-962-201-894-5 平裝 13 美元

我者與他者：中國歷史上的內外分際

許倬雲 著

978-962-996-390-3 精裝 23 美元

978-962-996-415-3 平裝 13 美元

周恩來的政治生涯 (參本刊頁21)

芭芭拉·巴努茵 (Barbara Barnouin)、余長更 著 馬繼森 譯

978-962-996-398-9 平裝 23 美元

夜來臨：吳國楨見證的國共爭鬥

吳國楨 著 吳修垣 譯 馬軍 校訂、註釋

978-962-996-350-7 平裝 23 美元

近代中國史綱(上、下冊)

郭廷以 著

978-962-201-353-7 平裝 18 美元

青春無痕：一個造反派工人的十年文革 (參本刊頁17)

陳益南 著

978-962-996-297-5 平裝 21 美元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 (參本刊頁9)

高華 著

978-962-201-920-1 平裝 24 美元

紅衛兵日記

陳煥仁 著

978-962-996-257-9 平裝 27 美元

胡適與現代中國文化轉型

劉青峰 編

978-962-201-620-0 平裝 18 美元

革命吞噬它的兒女：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案紀實

徐慶全 著

978-962-996-349-1 平裝 20 美元

商務印書館與近代知識文化的傳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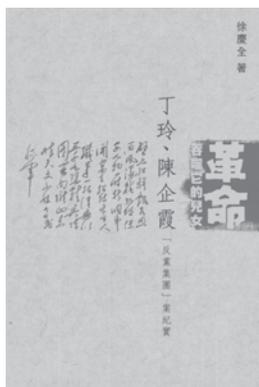
李家駒 著

978-962-996-307-1 平裝 15 美元

國家·社會關係與八九北京學運 (參本刊頁30)

趙鼎新 著

978-962-996-252-4 平裝 28 美元



從投資公司到「官辦商行」：中國建設銀公司的創立及其經營活動

鄭會欣 著

978-962-201-982-9 平裝 16 美元

晚清上海：一個城市的歷史記憶

梁元生 著

978-962-996-366-8 平裝 16 美元

晚清商約外交

王爾敏 著

978-962-201-846-4 平裝 16 美元

清末議訂中外商約交涉(上、下冊)

王爾敏、陳善偉 編

978-962-201-486-2 平裝 65 美元

超凡領袖的挫敗：文化大革命在武漢 (參本刊頁14)

王紹光 著 王紅纘 主譯

978-962-996-346-0 平裝 23 美元

開放中的變遷：再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

金觀濤、劉青峰 編

978-962-201-619-4 平裝 18 美元

鴉片戰爭的再認識

林啟彥、朱益宜 編著

978-962-996-079-7 平裝 16 美元

A Glossary of Political Terms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ompiled by Kwok-sing Li Translated by Mary Lok

978-962-201-615-6 PB US\$26

Antiforeignism and Modernization in China

Kuang-sheng Liao

978-962-201-490-9 PB US\$11.5

Art and Politics in China, 1949–1984

Maria Galikowski

978-962-201-649-1 PB US\$32

China, Britain and Hong Kong 1895–1945

Chan Lau Kit-ching

978-962-201-409-1 HB US\$30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ink Tanks and China's Policy Towards Japan

Xuanli Liao

978-962-996-266-1 HB US\$49

From Youthful Manuscripts to River Elegy: The Chinese Popular Cultural Movement

Edited by Cheng & Jin

978-962-201-762-7 HB US\$27

Jingji Xue: History of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Economic Ideas into China, 1850–1950

Paul B. Trescott

978-962-996-242-5 HB US\$55

Some Did It for Civilisation; Some Did It for Their Country: A Revised View of the Boxer War

Jane E. Elliott

978-962-996-066-7 PB US\$23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Foreign Ministry of China

Ma Jis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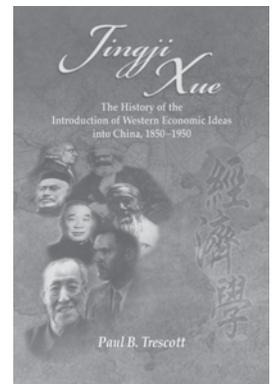
978-962-996-149-7 HB US\$39

978-962-996-202-9 PB US\$25

The Meaning of Freedom: Yan Fu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Liberalism

Max Ko-wu Huang, with a foreword by Thomas A. Metzger

978-962-996-278-4 HB US\$55



**Under the Soviet Shadow The Yining Incident:
Ethnic Conflicts and International Rivalry in Xinjiang, 1944-1949**

David D. Wang
978-962-201-831-0 PB US\$38

**Where Empires Collided:
Russian and Soviet Relations with Hong Kong, Taiwan and Macao**

By Michael Share
978-962-996-306-4 HB US\$55

Zhou Enlai: A Political Life (參本刊頁21)

Barbara Barnouin and Yu Changgen
978-962-996-244-9 HB US\$52
978-962-996-280-7 PB US\$25

代理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Database

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Edited & compiled by The Editorial Board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D-ROM Database
in the US and Universities Service Centre for China Studies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hief Editor: Song Yongyi
978-962-996-322-4 US\$1,300 (Institutional) US\$300 (Individual)

MORNING SUN 八九點鐘的太陽

導演：卡瑪、白杰明、高富貴
978-962-996-275-3 機構 100 美元 學校 65 美元 個人 16 美元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二卷 向社會主義過渡：中國經濟與社會的轉型(1953-1955)

林蘊暉 著
978-988-175-622-0 精裝 55 美元
978-988-172-742-8 平裝 36 美元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三卷 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 (1956-1957)

沈志華 著
978-988-175-623-7 精裝 55 美元
978-988-172-743-5 平裝 36 美元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四卷 烏托邦運動：從大躍進到大饑荒 (1958-1961)

林蘊暉 著
978-988-175-624-4 精裝 55 美元
978-988-172-744-2 平裝 36 美元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五卷 歷史的變局：從挽救危機到反修防修 (1962-1965)

錢庠理 著
978-988-175-625-1 精裝 43 美元
978-988-172-745-9 平裝 29 美元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六卷「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 (1966-1968)

卜偉華 著
978-988-175-626-8 精裝 55 美元
978-988-172-746-6 平裝 36 美元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八卷 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從批林到批鄧 (1972-1976)

史雲、李丹慧 著
978-988-175-628-2 精裝 55 美元
978-988-172-748-0 平裝 36 美元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十卷 歷史的轉軌：從撥亂反正到改革開放 (1979-1981)

蕭冬連 著
978-988-175-620-6 精裝 55 美元
978-988-172-740-4 平裝 36 美元

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

金觀濤、劉青峰 著
978-988-175-631-2 平裝 33 美元



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版及線上版

宋永毅 主編

美國《中國文化大革命資料庫》編委會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

編撰、出版



UPGRADED EDITION

- 大部份的中央文件、指示、公報、領袖和首長講話、重要報刊社論和當年的重要大字報等資料均標有出處。
- 資料達三千五百萬字，比 2002 原版增加將近五百萬字。
- 可用中英文進行“主題”，“日期”，“作者”，“標題”，和“關鍵字”等檢索、查閱。
- 線上版資料每年更新。

八九點鐘的太陽 MORNING SUN



獲美國歷史學會2004年度最佳歷史紀錄片獎

亞太區發行：中文大學出版社及中國研究服務中心

內容簡介

《八九點鐘的太陽》是一部震撼人心的歷史紀錄片。它記述了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揭示了群眾性政治運動與話語、美學、以及與旨在左右民眾視聽的場景營造之間的關係，並展現出當時的電影文化。《八九點鐘的太陽》

追蹤了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中國不斷激進的革命思潮及其在電影中的反映。電影製片者並非單純地以畫面來陳述事實，而是巧妙地顯示出在20世紀的革命運動當中，影像本身推波助瀾的強大力量。

製作、導演：卡瑪、白杰明、高富貴



2005 ISBN 962-996-275-6
片長 117分鐘

章節目錄

- 引子—東方紅
- 大躍進
- 自我否定
- 大風大浪
- 紅八月
- 新長征
- 大亂大治
- 天壤之間
- 革命萬歲·革命死了

編餘資料

- 遇羅文家庭五十年代遭遇
- 黃永玉的動物短句
- 李振盛的文革照片
- 鐵樹開花 啞巴說話
- 階級鬥爭教育

語言：中文、英文、法文、德文
字幕：中文（繁體）

最具規模的中國當代史·歷時七載的浩大編史工程

• 香港中文大學隆重推出 •



十卷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81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81)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這是到現在為止，一部規模最宏大、敘事最詳盡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余英時（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

「……突破中國官方機構對資料的壟斷和保衛，有豐富的文獻檔案以為基礎，史實的可信度極高。」

——陳永發（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

「把當代中國驚心動魄的歲月轉化為歷史著作，是對中國歷史學家的考驗。」

——金觀濤（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 權威的出版 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籌劃逾七年，總字數逾六百萬字，全套共十卷。各卷既獨立自足，又互相呼應。
- 強大作者群 作者均是長期從事中共黨史和國史研究的著名專家學者，分別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黨校及國內多家重點大學。
- 翔實的內容 各卷內容均突破意識形態的限制，建基於檔案、文獻、回憶錄和口述史料，以至新公開資料、學術界最新研究成果，務求還原歷史本來面貌。以1949年至1981年中國大陸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為主線，既有對高層決策和鬥爭的揭示，又有表現芸芸眾生的喜怒哀樂、社會風貌和流行思潮的生動畫面。

各卷目錄

- *第一卷 楊奎松：斷裂與延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1949-1952）
- 第二卷 林蘊暉：向社會主義過渡——中國經濟與社會的轉型（1953-1955）
- 第三卷 沈志華：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1956-1957）
- 第四卷 林蘊暉：烏托邦運動——從大躍進到大饑荒（1958-1961）
- 第五卷 錢庠理：歷史的變局——從挽救危機到反修防修（1962-1965）
- 第六卷 卜偉華：「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1966-1968）
- *第七卷 高華：新秩序和新衝突——從中共九大到林彪事件（1969-1971）
- 第八卷 史雲、李丹慧：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從批林到批鄧（1972-1976）
- *第九卷 韓綱：革命的終結——從「階級鬥爭為綱」到「經濟建設為中心」（1976-1978）
- 第十卷 蕭冬連：歷史的轉軌——從撥亂反正到改革開放（1979-1981）

*即將出版



本社網頁 www.chineseupress.com 提供內容試閱，歡迎瀏覽。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全球發行及總代理
SOLE DISTRIBUTOR AND AGEN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HONG KONG



中文大學出版社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www.chineseupress.com
HONG KONG, CHINA

網上資料 • ON-LINE INFORMATION
www.chineseupress.com